



唐太宗与 贞观之治论集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1.3411.19

1014499



B0126156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

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ZD25/45



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74,000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统一书号：11094·76 定价：0.76 元

前　　言

唐太宗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贞观时期是封建社会中有名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对唐太宗与“贞观之治”的研究，实际上早在五代时期就开始了，宋明以来，迄未间断。但旧史家们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对唐太宗个人品质才干的评价和就事论事地评论贞观政事的得失上。解放后，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进行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深度，开拓了很多前人从未涉及的新方面，使之成为唐史领域中研究较多并取得一定进展的问题之一。

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间，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专著外，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论文约计几十篇，其中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约有十几篇，其余大多集中在最后二、三年。这些论文在对唐太宗的个人评价方面，不仅研究了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作用，也探讨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不仅有全面评价，也有对他的纳谏、用人、执法及对待少数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具体研究。总的看来，史家对唐太宗的评价基本一致，都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其历史功绩应予肯定，也都指出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唐太宗也犯有一些罪过和错误，分歧只是出现在对他的功过估价程度以及某些具体

问题上。对“贞观之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形成的原因和取得的成就上。一般认为，“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隋末农民战争直接调整了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再就是隋末农民战争推动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采取了一些适应生产发展、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研究者们对这两方面的原因各有侧重，但基本都认为二者兼而有之，只是在作用大小和有无“让步政策”上有一定分歧。近年来，有的同志进一步提出：农民战争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而广大农民在战后努力参加生产才是造成贞观盛世的根本原因。至于贞观时期取得的成就，史家意见基本一致，都取肯定态度。

三十年来，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研究工作也曾出现过一些偏向。至于“四人帮”将唐太宗说成“法家”，“贞观之治”说成“法家路线的产物”，则全系无稽之谈，不属于学术研究范围，本书概不涉及。

这本论文集选编了解放后公开发表的各种角度的论文十六篇（除做了个别文字改动及技术性加工外，基本保持原貌），并附有目录索引，希望能为从事唐太宗与“贞观之治”研究工作以及对此有兴趣的同志提供一些方便，疏漏和错误之处，请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高世瑜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前言.....	高世瑜 (1)
论唐太宗.....	韩国磐 (1)
唐太宗.....	汪 簡 (14)
“恐人不言，导之使谏”	
——略论唐太宗政治思想	李华兴 许道勋 (66)
略论唐太宗的选用庶族地主.....	韩国磐 (77)
试论唐太宗的用地方略.....	常 洪 (88)
唐太宗任贤的历史经验	
——读史一得.....	李艺荣 (100)
略说唐初的“立法”与“守法”	宋家钰 (120)
略论唐太宗统治时期的法律思想.....	何汝泉 (127)
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魏国忠 (143)
论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起义的关系.....	翁大草 (155)
略论“贞观之治”	杨国宜 (167)
论“贞观之治”	
——兼论隋末唐初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政策 的相互关系	徐连达 (179)

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 倪正太 (195)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

——略论唐代贞观年间的“论今引古” 郭志坤 (213)

漫谈贞观年间的政权机构和行政效率 翁俊雄 (225)

评《贞观政要》 吴 枫 (234)

附：1949—1980年论文目录 (246)

论 唐 太 宗

韩 国 磬

一 农民起义给予唐太宗的教训 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翻开唐人吴兢所写的《贞观政要》，看到唐太宗君臣谈到以亡隋为戒的事，有四十五处。其中谈到隋的暴政如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残酷地剥削人民、惨毒地镇压人民，亦即关于阶级矛盾方面者，有二十一处；谈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方面者，有十余处，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大多数牵涉到阶级矛盾问题。至于谈到隋朝以前如秦始皇等因刻剥人民而致乱亡者还很多。因此，唐太宗君臣以亡隋为戒，主要就是以隋的暴政引起农民大起义为戒。

在《贞观政要》第一卷第一篇《论君道》中，魏征概括隋亡的原因说“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多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这里从各方面指出隋炀帝剥削人

民，使阶级矛盾尖锐化，终于被人民伟大的起义斗争所推翻，因而不得不引为深戒，亦即所谓“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从某个方面来说，如唐太宗知道“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就是鉴于秦皇汉武特别是隋代“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所以才能“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①其次，唐太宗统治时所以不敢过分地剥削入民，同样是鉴于亡隋之辙，所以说：“隋开皇……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②。在这样的教训下，唐初才不得不减轻赋敛的。再次，在役使人民方面，看到隋朝营建东都宫殿，从远道运送大木料，“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余费又过倍于此。……乾元（东都殿名）毕工，隋人解体。”^③看到隋炀帝广建离宫别馆，修治驰道，“人力不堪”，相聚反抗，以至“尺土一人，非复已有”^④。所以才停修乾元殿，略为缓和苛重的劳役。再次，在巡行时，责备蒲州刺史赵元楷供应侈靡说：“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⑤由于深鉴亡隋之弊，才多少减少了巡行时的铺张和耗费民力。复次，在刑法方面，目击隋炀帝的滥刑，逼使人民不得不起而推翻隋朝。因此，唐太宗君臣才不

①《贞观政要》卷8《论务农》。

②同上书，《辩兴亡》。

③同上书，卷2《论纳谏》。

④同上书，卷10《论行幸》。

⑤同上书，卷6《杜谗邪》。

得不“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①从而修订刑法，缓和对人民的镇压。最后，再举一例，唐太宗要攻打高丽，房玄龄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困败，实此之由。”^②唐太宗在口头上表示同意这一意见，而实际则依然出兵进攻，但结果是失败而回。从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在接受了人民推翻隋朝的教训的地方，就取得了成就，如果不接受教训，则在这些地方就要招致失败。不过攻打高丽已是贞观末年的事了。

由上述诸事可知，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力行均田以恢复和发展农业，减轻租赋徭役，抑制一下宫殿的修饰和巡行时的铺张，缓和刑罚，无不是鉴于农民起义推翻了暴隋的统治，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巨大，才不得不对农民让步的。在《贞观政要》一书中谈到人民力量的巨大处很多，仅以水比喻人民、以舟比喻君主的至少就有五处，如卷一《论政体》中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卷三《论君臣鉴戒》、卷四《论教戒太子诸王》等篇中，都一再提出这个比喻。并且明白指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③由此可见，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对伟大的人民力量，深怀畏惧，时存戒心，所以才不得不对人民让步。而这种畏惧和戒心，正由于目击人民力量推翻了暴隋统治，亦即隋末农民起义给予唐太宗等人以非常深刻的教训。此外，更有值得注意的事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有些士族豪强，全家被镇压，如贝州人路文逸，“閩门遇‘盜’”^④，

① 《贞观政要》卷8 《论刑法》。

② 同上书，卷9 《议征伐》。

③ 同上书，卷1 《论政体》。

④ 《旧唐书》卷189下 《路敬淳传》。

亦即全家被起义军镇压掉，只有本人逃免。被起义军镇压掉的地主的田产，自然会归还于农民。另则由于隋的暴政，不少地方人民逃亡，出现大量荒地。既然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一些田地，既然存在大量荒地，在魏、齐、周、隋都连续推行均田制的历史条件下施行均田就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综合说来，唐太宗时的各项改革，各种有利于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归根结底，都应归功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伟大的隋末农民大起义，才是逼使唐太宗进行改革，推动唐朝经济和文化辉煌发达的根本动力。

二 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主要成就

现在，就简述一下唐太宗及其统治时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第一，唐朝的统一事业，主要是由唐太宗率领部下来完成的。他既灭兰州的薛仁果，复平马邑的刘武周；既俘虏了洛阳的王世充，又镇压了河北的窦建德；还镇压过河北的刘黑闼和兗州的徐圆朗等。当时统一全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由谁来统一的问题。唐太宗这方面具有优越条件，故能完成统一，但在统一过程中镇压了不少起义军如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等，我们绝不能因为统一就来否定这些起义军。当虎牢战后，窦建德被俘，王世充出降，唐朝对两人的处分就不同，建德被杀，世充只是贬迁蜀中，还是在路上为仇人所杀。为何唐朝这样处理？只有从阶级分析出发，才能找出根本原因。唐朝统治者对农民起义领袖如此杀害，如果现在还从统一来否定农民起义军，那真是大错！所以唐太宗统一全国的功绩是大的，是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家，但镇压农民军的罪过却不能因此勾销。

第二，在经济方面，由于农民起义的严重教训，唐太宗不

得不力行均田，劝课农桑，缓和剥削。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所颁布的均田令和赋役令，主要是在贞观时才努力推行的。唐太宗自己曾这样说：“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①。就到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幸灵口，村落偏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②可见当时力行均田的一斑。按虫霜水旱灾害情况的轻重分别减免赋役，较能做到的主要也在贞观时期，如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即因山东诸州大旱，免掉这里当年的租赋。以后还曾因灾害多次减免课役。这些劝农、均田、减赋的措施，为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以后开元的全盛时期，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政治方面，精选临民的地方行政长官如都督、刺史等，于屏风上写上都督、刺史的姓名，记其善恶，“坐卧恒看”，因为这些人“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③又尽量选拔寒素出身而有才干的人到封建中央任职，如马周、刘洎、孙伏伽、张玄素等都被任以要职。发展科举，重视进士科，也正是笼络人心，从地主各阶层中选拔封建统治人才的办法，所以唐太宗在端门看到新进士，才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④但对于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士族这一阶层，则予以抑制，唐太宗命令以当时官爵高下作等级来撰定《氏族志》，抑山东老牌士族崔氏为第三等，就是明证。对于中央三省职责，有分工而又能发挥其作用，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

① 《贞观政要》卷 8 《论务农》。

② 《册府元龟》卷105《惠民》。

③ 《贞观政要》卷 3 《论择官》。

④ 《唐摭言》卷 1。

执行。故唐太宗这样说：“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如果苟因私情，顾惜颜面，不对的事不加纠正，照例施行下去，“此实亡国之政”^①，这里就是要中书、门下发挥它们的作用。唐太宗又规定，死刑如在中央处决要五复奏，在地方上也要三复奏。除去了一些苛法，放犯人回家过年，故史言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②特别是唐太宗能够纳谏，除魏征是当时有名的“诤臣”外，他如房玄龄、王珪、李百药等都能进谏，唐太宗也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③正由于唐太宗君臣这样的“励精图治”，所以才会出现当时“政治修明”的局面。

第四，在军事方面，由于突厥的连年进扰，甚至打到武功，京师戒严，于是，恢复关中十三道的军府。唐太宗并“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射，帝亲自临试”，“自是后，士卒皆为精锐。”^④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⑤。同时，这是沿隋而来的“寓兵于农”的制度，“三时耕稼，拔穫耘耒；一时治武，骑剑兵矢”^⑥，“居闲岁则橐弓力穑，将有事则释耒荷戈，”^⑦由于军事上的这些措

① 《贞观政要》卷1《论政体》。

② 《旧唐书》卷3《太宗纪》。

③ 《隋唐嘉话》卷上。

④ 《旧唐书》卷2《太宗纪》。

⑤ 《唐会要》卷72《府兵》。

⑥ 《杜樊川集》卷5《原十六卫》。

⑦ 《旧唐书》卷190下《刘蕡传》。

施，加强了封建中央的武力，打退了突厥等的进扰，巩固了国防。

第五，在文化方面，置史馆于禁中，以宰相监修，编成晋、梁、陈、北齐、北周、隋各代史书。提倡儒学，奖掖文士，秦府十八学士中唐太宗最重视虞世南，称之为“行秘书”。由虞世南、颜师古等建议，购求天下图籍，进行整理，抄藏内库。为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命魏征等编成《群书治要》，命孔颖达等编成《五经正义》，又由高士廉等编成《文思博要》，魏王李泰等修成《括地志》等。

由于唐太宗重新统一了全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和整顿，奠定了唐朝的立国规模，故封建史官对他备极赞扬，他在位的贞观年代的治绩，被艳称为“贞观之治”。旧史记载“贞观之治”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①这个记载，当然有许多粉饰和夸张，然而，确也反映出当时吏治较好、刑罚缓和、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情况。因此，“贞观之治”的成绩是巨大的，确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治平”的时期之一。但不要忘记，这是在当时历史前提下，是在隋末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和唐太宗亲手镇压了不少起义后出现的局面。

^① 《贞观政要》卷 1 《论政体》。

三 “贞观之治”的后期大不如前

“贞观之治”的成绩虽大，但并非始终如一，前后期判然有所不同。“贞观之治”的前后不同，也正表现出唐太宗对农民的让步是有限的和暂时的。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前后不同的事实吧！

大体可以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为界，将唐太宗统治的时期划分为前后期。仅就纳谏方面来说，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魏征曾对唐太宗说：“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①。从这里看出，在贞观十年以前，或则启发人进谏，或则悦以从谏，总是乐于接受谏言的。但以后就不乐人进谏了。在不少事情上，拒绝谏言，如违谏进攻高丽的事即是。在刑罚上，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指出贞观初年按法律判决案件，“而‘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川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②。这样，轻重任情，不依科条，刑罚自然日趋滥酷。

特别是对人民的剥削方面，在贞观十年后，由于唐太宗的日趋奢纵，刻剥也日甚一日。故马周在贞观十一年时说：“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粟，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怨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粟十余石，百姓皆以为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

①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② 同上书，卷5《论公平》。

言，以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贞观五、六年来已渐多营造，而到马周上疏时，更是“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春秋冬夏，略无休时”^①。可见贞观十年后对人民的奴役愈重。及至贞观末年，“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而土木之功，“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②，唐太宗的奢纵和刻剥人民的本质，大大暴露出来了。

正由于唐太宗在后期日趋奢纵，奴役人民也日甚，故魏征恐其“不能克终俭约”^③才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上疏进谏。在这篇上疏中，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前十余年和顷年来的不同。一则贞观初年清静无为，近则远求骏马奇珍；二则贞观初年体恤人民，近则轻用民力；三则贞观初年损己利物，近则纵欲劳人而意在杜谏；四则贞观初年亲爱君子而疏斥小人，近则昵近小人而疏远君子；五则贞观初年捐弃金玉，今则好尚奇异；六则贞观初年求贤如渴，近则好恶由心，使夤缘者日进；七则贞观初年不事畋游，近则晨出夜还，畋游无度；八则贞观初年上下情通，近则君臣有隔；九则贞观初年谦虚若不足，近则恃功骄矜；十则贞观初年虽遇天灾而民不逃散怨望，近则百姓疲于徭役而生怨心。这可说是魏征对于“贞观之治”前后不同的总结。固然，贞观后期比暴君的统治还好，故唐太宗在其遗诏中犹自我夸张地说：“至于比屋黎元，关河遗老，或赢金帛，或赉仓储”^④。但比起贞观前期，大有不同，当时的

①《唐会要》卷83《租税上》。

②《贞观政要》卷9《议征伐》。

③同上书，卷10《论慎终》。

④《唐大诏令集》卷11《太宗遗诏》

大臣、帝妃看得很清楚，当时的人民看得更清楚。

为何在唐太宗统治的贞观后期大不如前呢？一则由于在贞观前期唐太宗君臣的“励精图治”，各项制度和措施的改革和整顿已经大体完成，统一国家的局面稳定下来，社会经济已在恢复和发展。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又彻底打垮突厥的进扰，俘获了颉利可汗，西北边防大为巩固了。这些情况，就成为唐太宗骄傲自满和奢侈纵欲的本钱。其次，房玄龄就说到唐太宗能力很强，“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①，这里当然有许多奉承话，却也反映出唐太宗有着过人之才。不过，这又提供了他自我矜伐的条件。因而到贞观八、九年时，就常自我矜夸说：“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②固然唐太宗有超越前人的地方，但这样自我称扬的封建帝王，必然会自以为是，不听谏言，从而走向下坡路。三则在阶级社会中，纵然是最进步的统治阶级人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是奴役劳动人民的本质的一面，二是在人民力量和社会发展要求下不得不作让步的一面。唐太宗的“诤臣”魏征就这样说：“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侈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迹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

① 《贞观政要》卷9《议征伐》。

② 同上书，卷10《论慎终》。